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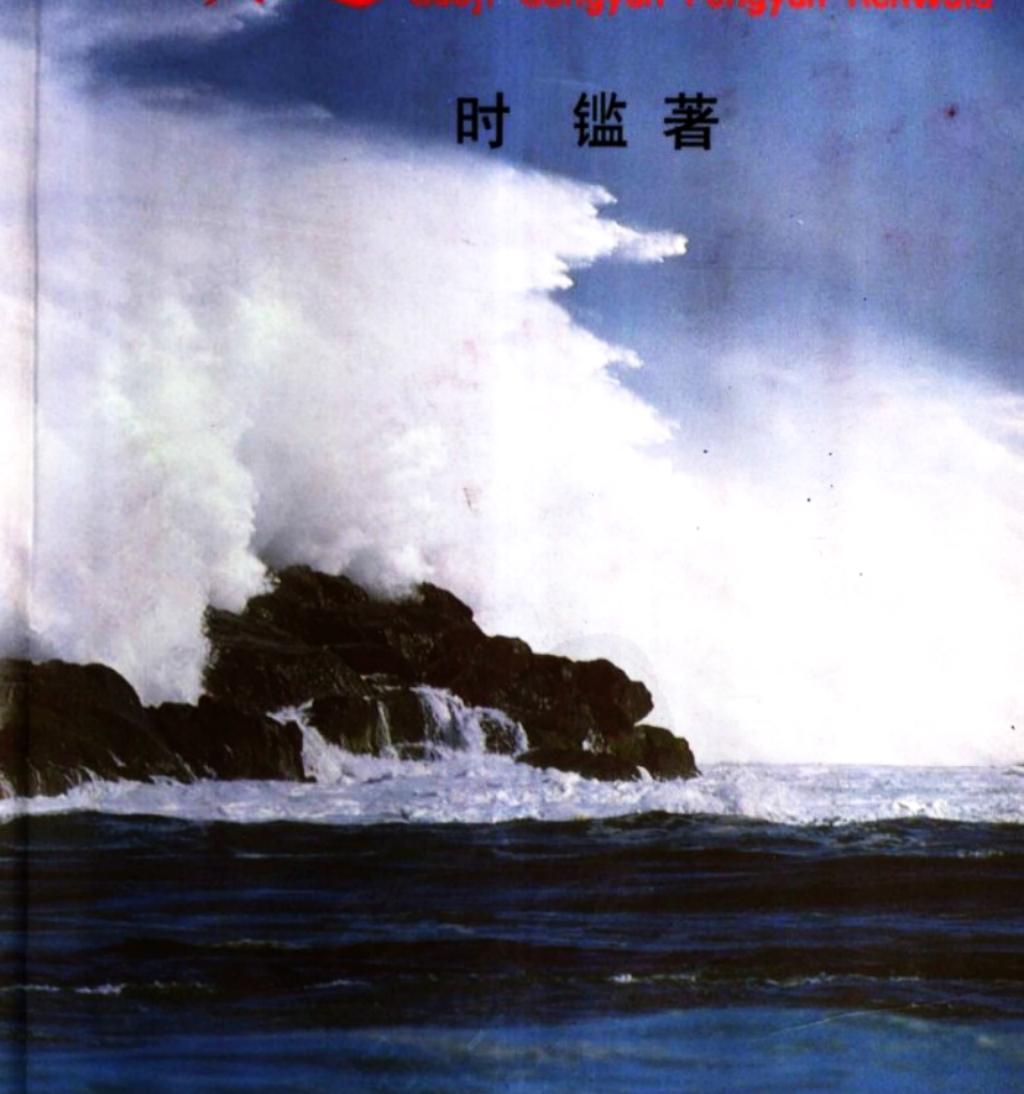
国际风云人物录

国际共运

风云人物录

Guoji Gongyun Fengyun Renwulu

时 镜 著



国际共运风云人物录

时 镛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共运风云人物录/时鑑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2

ISBN 7-5034-1491-X

I. 国… II. 时… III.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人物-列传 IV. K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3482 号

责任编辑：汪 新 封面设计：时 鑑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济源市 531 印刷厂 邮编：454692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2.875 字数：596 千字

印 数：2000 册 插页：10

版 次：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谨对关心本书出版的

济宁市发展计划委员会	主任	张生贤
济宁市经济贸易委员会	主任	张昭贤
济宁市教育局	局长	张新广
济宁市科学技术局	局长	刘积才
济宁市财政局	局长	张延根
济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局长	尹凤珠
济宁市水利局	局长	刘宪存
济宁市农业局	局长	杨绪亮
济宁市文化局	局长	樊刚
济宁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任	颜廷芳
济宁市统计局	局长	郑钦祥
济宁市建设委员会	主任	郝进
济宁市规划局	局长	韩连绪
济宁市林业局	局长	康绍军
济宁市渔业局	局长	赵忠芝
济宁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主任	赵金钟
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主任	谢克俭
济宁市招商局	局长	李文运
济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局长	袁国平
济宁市供销合作社	主任	张国贤
济宁市航运管理局	局长	沈学启
济宁市农业机械管理局	局长	彭广含

致以诚挚的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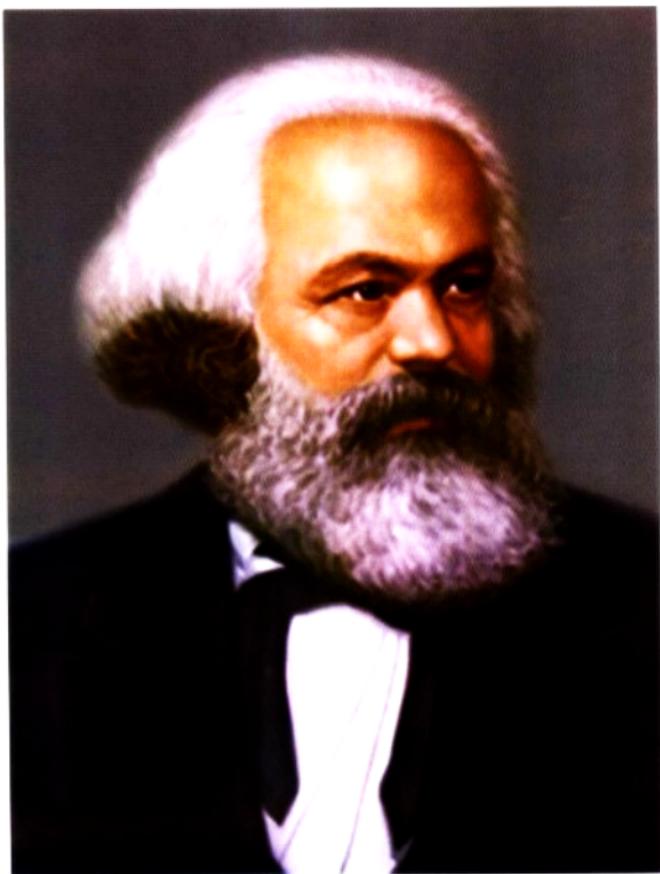
特别鸣谢

济宁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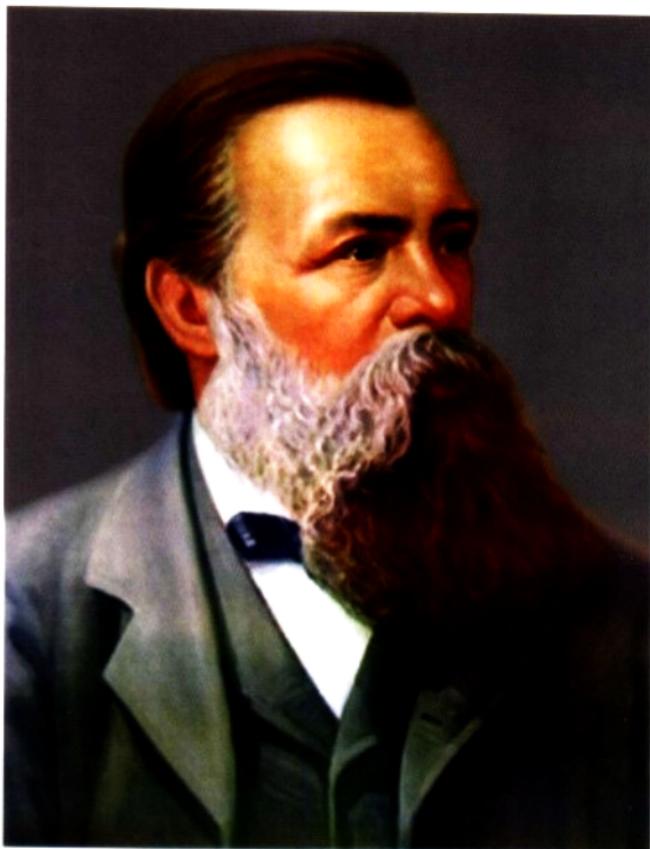
董事长 王彦伦

山东永泰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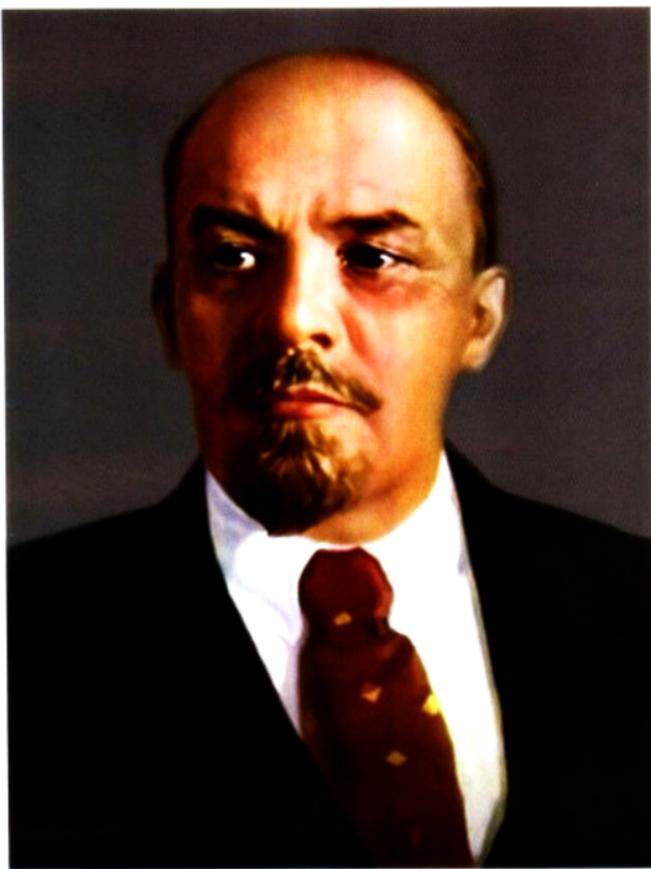
董事长 李玉岱



Karl Marx (马克思)



F. Engels (恩格斯)



Vladimir Lenin (列宁)



M. G. Stalin (斯大林)

前　　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在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为推翻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运动相比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最具目的性、最具广泛性，并且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最波澜壮阔的运动。19世纪40年代，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和作为同盟纲领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是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无限憧憬的一个伟大的梦想。春秋末年的思想家孔子在一次参加腊祭典礼后，来到宗庙门楼的高台上游览，不禁喟然长叹，对学生言偃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世界的梦做了几千年，人们所看到的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公元1885年，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写成《大同书》，构画出一个“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虚幻世界。毛泽东正确分析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从世界范围看，在公元16世纪之后的300年时间里，伴随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欧洲产生了一大批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阶级对立，主张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私人发财制度，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

体系提出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组织和劳动生产率将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不成熟的时期，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理论不成熟。“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列宁选集》第2卷，第445页）。

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在西欧主要国家已经进入到高度发展的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主义矛盾和弊端已经充分暴露，现代产业无产阶级已经开始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的实践，逐步完成了从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们在总结人类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奠定了两块理论基石，使社会主义终于驱散了空想的迷雾而发展成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同蒲鲁东派、拉萨尔派、巴枯宁派、工联派的斗争中，确立了自己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承担起继续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并写下许多重要著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1889年恩格斯参加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并指导它的活动，同其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除此之外，恩格斯还花费很大精力，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为他的朋友建立了一块庄严宏伟的纪念碑。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新的形势下，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在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特别是在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斗争中，从各个方面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创立了列宁主义。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

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85页）在列宁主义指导下，俄国无产阶级于1917年俄历10月25日举行武装起义，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宣告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始。

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国内坚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在卫国战争期间，领导苏联人民和军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领导苏联人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对巩固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贡献。斯大林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继承和捍卫了列宁主义，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等重要著作，提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为维护党的纯洁、巩固党的统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对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起了指导和鼓舞作用。

列宁说过：“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列宁选集》第1卷，第210页）。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一代代共产党人，在领导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壮丽事业努力奋斗的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书写了一一页页光彩照人、富有魅力的篇章。本书作者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崇敬的心情，在刚刚完成210万字的《中华历代英杰传记》之后，花费两年时间，阅读原著，查找资料，考证史实，写出一部近60万字的《国际共运风云人物录》，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6周年之际，奉献给读者，奉献给立志为共产主义壮丽事业而奋斗着的人们。

杰出的人物的传记历来是研究那些积极投入社会和政治事件的人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往往使人们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发展的各种原因和进程。通过传记体裁反映历

史，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现给读者，从而鼓励、感染更多的人投身于雄伟壮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十分看重的一项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历史文献中，传记著作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自己的忠实战友们的生平事迹，并且在传记作品中为工人阶级介绍了如威廉·沃尔弗、约翰·菲利浦·贝克尔这样一些杰出革命家的功绩。恩格斯在马克思健在时就撰写并发表了《卡尔·马克思》(1868年)传记文章，叙述了马克思的生平，阐明了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对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意义。列宁认为一部革命史就应当是由一个个革命者的传记所组成，他饱蘸革命激情写了《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欧仁·鲍狄埃》等传记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学家梅林则因写作《马克思传》而名垂青史。

写作《国际共运风云人物录》期间，我每每被伟人业绩、伟人魅力、伟人思想所感染，心中常常充满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同时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失误而扼腕。应当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前无古人的、无可借鉴的，需要促进人们思想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运动，这场运动必将在总结经验，吸取失误、挫折教训的基础上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本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更加坚定不移地相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尽管道路曲折、漫长，但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代表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根本利益，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并在继续产生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样伟大的杰出人物。

时 镛

公元 2003 年 12 月 29 日零时 6 分于济宁学思斋

感谢生活

——本书作者时鑑自传

公元 1957 年 10 月 5 日，我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一个普通市民家庭。这实际是我的姥姥家，我的祖籍则是在距济南市几百里之外的汶上县南旺镇杏林村。正如每个家庭都会对新增添的小生命表示欢迎一样，我姥姥家也因为我的出生而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气氛。姥爷朱松亭引经据典，为我取名叫“时鑑”。“鑑”字取义于宋代司马光写的一部史学名著：《資治通鑑》。据外祖父解释，“鑑”字有三种意义：一是镜子；二是审视；三是可训之事。这就是说，外祖父希望外孙首先要像镜子一样洁净，清清白白地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其次要警人察己，对人要辨善恶，对己要日三省吾身；第三就是希望外孙长大后能够献身于历史研究。

我在外祖父家大约过了三年，后因赶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才被在济宁县（今任城区）工作的父母接回济宁。父亲时玉山、母亲朱纹均为小学教师，当时月工资总计 102 元。我回济宁后与哥哥时钢被父母送到济宁市黄家街幼儿园全托，我们两人每月要交托儿费 48 元，这便占了父母工资总额的一半。

我自认为我的幼儿时代是快乐的。幼儿园里有秋千，有木马，有布娃娃，最有意思的莫过于一群花花绿绿的小朋友们。我们排队伸出小手比清洁，排队到餐厅吃饭，排队到教室听课，排队上厕所，然后等阿姨揩屁股……总之，一切都得排队，这种集体生活使我懂得了一切都要遵守纪律。

也许是因为年龄小，幼儿园的事情我记的并不是太多。印象中有一个好大的院子，房子也有许多，上课、吃饭、睡觉都有专

门的房间。睡觉的房子在最南边，也最大，里面摆满了小床。上课大都是坐在小椅子上摆弄各种玩具。每到阴雨天，我们就会站在门前对着天空高唱：

老天爷爷快下吧，
坑里的蛤蟆干死了；
老天爷爷别下了，
坑里的蛤蟆长大了。

至于会涝会旱，全与我们这些幼小的生命无关。在幼儿园印象最深的，还是吃饭问题。当时我们晚饭吃不饱，到夜里便觉得肚子饿。后来我看大朋友们吃晚饭时光喝汤，把馒头留下来夜里吃。我便照他们的样子，也把馒头掖起来。但到了晚上，他们都自己脱衣服，我却因年龄小，需要阿姨帮着脱，于是露了馅，让阿姨把馒头拿了去。结果那天夜里，我饿得更厉害。

记忆中幼儿园阿姨有三个，一个姓侯，一个姓王，还有一个姓张。姓侯的阿姨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一起做游戏，一个人突然闯进院子，侯阿姨对他大发脾气，其情景令我感到非常吃惊。姓王的阿姨脾一些，有一次我竟然发现她偷吃我家里送来的食品——长大才明白，这一定是当时经济困难所致。

后来，我和哥哥同时出疹子，张阿姨下班时把我们带到她家——那是一个月色很好的夜晚，张阿姨家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棂子窗户上镀着玻璃。那一夜，我第一次感受到人间的温情。每当想起这样一个夜晚，总觉得心里好感动好感动。大概是第二天，父母把我们接回去，先是在济宁城北一家传染病院住了几天，然后便出院回廿里铺朱元庄小学上学了。

上学那年，我才5岁，学校也是极普通的农村小学。当时的我似乎还是无忧无虑的。每天除了上课便是与同学们玩耍，滑冰、推铁环、翻“宝”、弹琉璃蛋、跳房子、扔纸票、抽陀螺，后来又

学会打扑克、下跳棋、军棋、象棋，寒暑假偶尔跟母亲去济南，也算是见了大世面。

这样的日子过得又慢又快，转眼就到了四年级。当时初小升高小有名额限制，学校里推荐了8名，我没有被推荐上，觉得很丢面子，便要求随着去考，结果没考上。后来廿里铺完小为没有考上的学生办了一个民办班，我因此进入这个班学习。那一年是我比较用功的一年，每天天不亮就去上学，听课也比较认真，学习一年结束后，民办班与公办班实行统考，我被公办班录取。但母亲却怕我年龄小累坏了脑筋，替我办了退学手续。我知道后不依，自己去了廿里铺完小，老师说无法更改，我走出校门，回身面对学校，一行热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回到朱元庄小学，重上五年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燃及这个不算偏僻的村庄。那年秋天，公路上经常有打着旗帜、背着背包的红卫兵徒步走过。不久有消息传来，去北京的红卫兵都能见到毛主席，我当时也想去北京，但终因年龄小未能去成。然而就在那时，我尝到了政治上受压迫、肉体上受痛苦、精神上受折磨的滋味。

叙述这件事当然要涉及到我的家庭。我父亲家在京杭大运河畔的汶上县南旺镇杏林村。爷爷时云常青壮年时在外当店员，有时靠打鱼为生。大爷时玉珍早年参加了八路军，我奶奶就被还乡团逼死在磨房里。父亲好不容易上到四年级，后来靠自学考上管吃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1948年当地解放后，父亲当了小学教员，年年被评为先进教师。1955年他担任济宁县廿里铺、长沟、南张三个区的中心校长，工作上可谓一帆风顺。1957年整风反右，他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但并没有受到处分。然而到1959年第一次右派甄别，他却莫名其妙地接到一纸“摘帽、撤职、降薪”的通知，除撤销校长职务外，工资也由64.50元降到43.50元。遭此打击，父亲四处告诉无门，曾为此得了一场精神病。病愈后调到长沟公社的白果树村小学教书。“文化大革命”尚未开始，济宁县召集教师

集训，父亲和几百名教师被戴上“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帽子，押送回原籍。因为父亲一直未和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我尚未感受到这一变故对我的影响。

那是一个冬天的中午，母亲让我去借一个簸箕。磨坊里有与我年龄相仿的兄妹三人，我刚一张口，就听见他们之中一人喊了声：“揍他这个反革命羔子！”随即年龄稍大的兄弟两个冲出来，把我推倒在雪地里，然后是一顿拳打脚踢。发生这一事件之后，我的性格变得沉郁内向，很大程度上还有自卑。也就从这开始，我告别了还算称得上幸福的童年，开始进入一个苦涩的少年时代。

“文革”开始后，学校里一段时间停了课。因为生活日渐困难，我开始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如拾庄稼、拾柴火、挑水、烧锅、割草。头一年割草，辛辛苦苦一个夏天，晒干不过二三百斤，到冬天卖了不足10元钱。后来我们家养了一只母羊，放羊成了我主要的活路。生活劳累不算什么，最使人恼怒的还是心灵上的践踏。因为我们是“外来户”，加上父亲的政治原因，我在外面无论是干活还是玩耍，总要受到同龄人的欺侮。再加上“红卫兵”几次抄家，更让人心情沮丧到极点。父亲由于心情不好，每次回来见我在外面玩，便大发雷霆，扭着耳朵把我拉回家。这种来自家庭、外面双重的折磨，使我内心更感痛苦无助。

1968年冬天，嘉祥县两位教师或许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启发，别出心裁地提出一项建议：“教师回原籍。”这项建议被山东省革命委员会采纳后，济宁县率先执行，于是母亲带我与哥哥、妹妹一起回到我们的故乡——汶上县南旺公社杏林村。

杏林村是个近两千人的大庄子。当时有7个小队，6队与7队组成一个小庄，名叫南庄。我们的家就在南庄7队。刚到家时我们吃得很差，一段时间棉种窝窝是主食，有时只喝萝卜汤，地瓜干都成了好东西。父亲经过几上几下，这时已经恢复教师身份，看到我们回到他的老家，心情大概要好一些。这时他曾编了一首歌谣：